



20世纪初期到达纽约埃利斯岛的移民。

新概念 旧现实

全球化是近年才出现的新词，但市场、人员、理念和文化的国际化并不新鲜

哈罗德·詹姆斯

全球化触发了不同寻常的响应措施。如今，几乎每个关注全球化的人都一致认为当前人们对全球化的反对方兴未艾，但许多人觉得全球化这个基本过程是不可避免且不可逆的。

真的是这样吗？回顾历史有助我们了解反对全球化——即金钱、商品、人员、观念、技术和文化在各国家间的流动——运动的发展动态。

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化”一词出自上世纪70年代，用于描述油价上涨后的市场国际化，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但是它反映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实。近年来，全

球化似乎进入上升期，至少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是如此，但这种上升仅仅是散布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众多时期和逆转之一。

全球经济危机教会我们，依靠对短期内的数据进行推断得出的经济“发展趋势”分析会导致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结论。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数据的特殊及异常程度，也没有意识到全球互联的复杂性。意外危机所带来的冲击，让我们开始关注在更较长时期内所形成的模式。成熟且持久的模式会突出缺陷，而这些缺陷有助于我们发现调整制度框架的方法，使全球化变得更加稳定、安



全——且更加公平。

过去的全球化

描述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充满活力的全球贸易现已成为经济历史学家技能展现的一个标准配备(O'Rourke和Williamson, 1999)。但是,这一个时期并不是全球化的唯一插曲。考古学证据证实了罗马帝国的全球贸易影响力,当时的罗马货币不仅在这个永恒之城流通,还出现在了斯里兰卡和越南沿海地区。自此全球贸易和金融出现了众多的后续发展。在其中的很多发展过程中,古典时代和罗马全球化时代(和全球化规则)观念复苏,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成为文艺复兴的经济背景)以及18世纪出现经济反弹,在此期间,改良后的技术和更加快捷的沟通(为英国和法国)打开了全球化帝国的大门。

技术和全球化密切相关: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一现象描述为“技术全球化”。蒸汽发动机推动了19世纪的全球互联。在铁路机车中,蒸汽发动机开启了新的大陆,让农民可以为远离其家园的其他市场生产农产品。后来,轮船将各大陆连接起来,交通成本的急剧下降推动了市场的整合。交通的协调需要统一的信息,而电报可以传递市场所需要的信息——当1865年第一条稳定的横跨大西洋的电缆铺设完成时,跨越海洋发送电报成为现实。

由于印刷品和报纸等传播技术,人们能够增加对其他国家的了解,并将他们每日为生计而挣扎时所经历的严酷现实与富足、幸福的神话般的理想黄金国进行比较。因此,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承担巨大的艰辛,来完成这危险的旅程。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他们通常认为,希望之乡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可能不会变成现实,但有可能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实现。

安全阀

而移民不仅仅是个人对更好生活状态的一种追求。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移民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释放了移民输出国的社会压力。移民为技术变革及贸易过程带来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技术变革及贸易过程使各类经济活动成为多余。通过移民,个体创造了新的生活和新的机会。

在19世纪全球化的环境下,人口从欧洲周边非常贫困的地区(东欧、地中海欧洲国家和斯堪的那维亚)流出,提高了收入。特别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经济繁荣期,收入的提高非常可观。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初有3000万移民离开欧洲来到美国;约有650万人移民到阿根廷,500万人移民到加拿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境外出生人口份额比现在还高。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捕

捉到移民的政治动态——毫无疑问,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自己逃离纳粹德国的政治及种族迫害的经历(Hirschman, 1970)。移居他国(离开本国)越容易,对出生国的政治社会的承诺(忠诚度)就越低,并且表达思想(话语权)的需要越不迫切。当移民被阻止时,对话语权的需求就会提升。

移民接受国则表现出相反的动态。人口的移入不仅能提升忠诚度,还能带来经济活力。美国强大的企业精神——正如已故的托马斯·麦克劳(Thomas McCraw)所强调的——就是移民创造能力的见证(2012)。

有时,安全阀会转变人口的流向并造成其他地方的人口泛滥,致使人口迁移非常不得人心。对全球化的强烈抗议往往会攻击此前的移民安全阀,如今很多国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逆转

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有以下几个历史性的原因。

首先是对陌生事物的简单心理反应。人们满足于彼此间的互动;他们逃避外来事物,在面对全球化的威胁和破坏时,想要寻求保护。

远距离贸易这个话题往往会以对非必要性奢侈品的谴责而告终。

远距离贸易这个话题往往会以对非必要性奢侈品的谴责而告终。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中世纪基督教徒继任者托马斯·阿奎那都承认有些产品具有远距离交易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本国生产更加符合道德准则,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会破坏公民生活(Irwin, 1996)。罗马哲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曾抱怨罗马到处充斥着来自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昂贵又毫无用处的进口奢侈品,诗人塞克特斯·普罗佩提乌斯也曾抗议说“骄傲的罗马因财富而堕落”。新教改革的重要人物——神学家马丁·路德,反对意大利奢侈品日益侵蚀德国本土的朴素的产品。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也是反全球化运动——反对英国税收和英国跨国公司的奢侈产品(茶)。

对移民的强烈抵制还与本土主义有关。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阻止中国劳工入境的《排华法案》(并要求所有中国人在抵达美国时出示职业证明书)。此后,国会对该法案进行了多次修订(最终于1943年废除)。美国还通过了多项在更广泛意义上限制移民的法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逐一被总统否决。

历史为我们带来了第二个历史性原因:经济危机期间全球化崩溃瓦解。金融是造成国际联系不稳定性的最大因素。全球化扩大了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经济史上的一项



加拿大安大略省克利夫顿站，大西部铁路上的19世纪的火车头和车厢。

研究发现，与二战后20年间的有限金融互联相比，19世纪金本位一体化时期有更多的资本在各国之间流动。但在金本位下，也出现了更多的银行业危机。特别是1907年和1929年后的大规模金融危机导致了新的民族主义热潮，于是人们把金融危机归咎于外国人和外来影响。

第三种假设是金融市场的动荡或崩溃推动了对国际运行制度的探讨以及对全球舞台权力动态更加敏感。1907年的经济危机提供了重要经验，帮助我们认识金融危机的影响及金融改变政治的方式。1871年后，世界金融体系主要以英国为中心，尤其是伦敦。1907年10月的大恐慌体现了快速发展的新工业力量（特别是德国和美国）以及对使用金融力量的渴望。这次危机起源于美国，由于对现金的大量需求导致利率飙升，增加了对黄金进口的需求。但这次危机也导致其他国家的利率飙升，给埃及、意大利、瑞典和德国的银行——几乎全世界的银行都造成了压力。

1907年的经历让一部分美国金融家确信纽约有必要制定商业贸易制度，就像成熟、兴旺的伦敦市场那样，以同样灵活的方式确保金融交易的安全（Broz, 1997；Eichengreen 和 Flandreau, 2010）。其中，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就是推动美国承兑市场（短期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常用于金融进出口业务）发展的核心人物。沃伯格是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系统设计的主要参与者。他的弟弟，麦克斯·沃伯格（Max Warburg）曾是德国独裁者德皇威廉二世的私人顾问、汉堡知名银行家，后也移民美国。沃伯格两兄弟都是银行家，他们分别在大西洋两岸大力推动德国和美国的机构发展，旨在打破英国主导的工业和金融垄断。他们确信德国和美国将逐年强大，而英国将逐渐衰弱。

第四，全球化改变了地缘政治的局面，从而引发政治紧张，因此战争爆发，破坏了全球互联性，同时全球联系也是应对缺陷和战略相互依存的对策。来源于法国法律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的传统思想将商业视为和平的

源头。19世纪伟大的英国自由贸易家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和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对于“和平理念”最著名的描述来自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 1931），即“无形的经济力量将武器的力量化为泡影”。安吉尔的目的是展示经济相互依赖给统治和帝国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他从中看到了与罗马模式帝国主义的根本性区别，罗马模式依赖于对受统治人口的朝贡的榨取。“罗马不必建立市场，也不必为她的资本应用寻找一个领域。但我们需要。”

但是，相互依赖实现了一种可能，即将系统性破坏的威胁用作权力政策的工具（Lambert, 2012）。全球化世界中网络的复杂性及网络传播影响的方式使其成为权力斗争的理想工具。然而，利用网络权利的策略并不简单：破坏的威胁很容易反咬破坏者一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都曾实践过战略性破坏。英国对德国挑起战争，严密封锁海峡，1917年德国向英国发起了无限制潜艇战，但这两个国家的战略都适得其反。最终，两败俱伤。但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为时已晚。

全球化的经验

在全球化周期的每个阶段，我们往往依据当前的发展来进行推断，并认为这一特定的阶段会永久性持续下去——无论是信心满满的上升阶段，还是停滞不前及痛苦愤怒的衰退阶段。当上升趋势被打破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方向的迷失和幻灭。

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余波中，一个与100年前相似的理由促使德国和美国银行家不仅产生了改革金融制度的想法，而且开始考虑世界金融及经济的新格局。虽然美国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震源中心，但由于其金融体系深厚且成熟，因此美国比其他先进工业地区恢复得更好。美国的经验促使亚洲和欧洲就如何赶超美国制度的成熟和稳健展开了广泛讨论，就像1907年后德国和美国试图从伦敦和英格兰银行的模式中吸取经验一样。

正如一个世纪前一样，世界各地都在专注研究社会不稳定带给我们的各种经验教训。随着以人民币计价的对外贸易比例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的工作重点是在贸易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上世纪初，美国爆发了以纽约代替伦敦作为贸易承兑中心的争论，当前的中国正在复制当时的历史。

标准化的债券需要欧盟内部的政治和宪法改革。

而欧洲人学到的经验是认识到他们需要更加安全的

资产和更健康的政府债券市场，并将与美国国债相似的标准欧洲证券设定为发展方向。这与百年前的1907年银行危机爆发时德国社会所作的探讨相似。当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统一国债为中心建造了新的共和国时，许多欧洲经济学家以及业外人士从中看到了美国早期经验的价值。但标准化的债券需要欧盟内部的政治和宪法改革，所以恐怕难以周全——正如20世纪初德国证券的全面发展，最终还需要实现更加广泛的宪法化。

零和博弈

对其他一些国家来说，从2008年危机中习得的主要经验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冲突，各个大国在霸权主义斗争中进行零和博弈 (Rachman, 2011)。这场激烈的金融外交的目标是寻求美元的替代方案和国际化的金融体系，当然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2008年9月，为了对金融危机作出迅速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发表演讲，明显重演了上世纪60年代法国对美元过度特权的批判——美元凭借其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不受其他货币所受到的市场约束。2008年后普京的立场可以说是他对2008年教训的反思，否则很难从其他角度对此立场作出解释。2014年，中俄天然气交易的主要特征就是销售额未以美元计价——这同时满足了美国希望提升人民币重要性及俄罗斯希望在国际商务中减少对美元依赖的目标。在金融危机、毁灭性的战争和冲突过后，移民数量也会出现增长。

希望的愿景

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会议开幕时，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描述了他的愿景：

“我希望本次大会能够将焦点放在两个基本的经济公理上。第一个是：经济繁荣没有固定的界限。它不是会因分割而减少的有限物质。相反，其他国家越繁荣，每个国家所拥有的就越多……第二个公理是第一个公理的必然结果。繁荣，如同和平，是不可划分的。我们无法让它降临到一两个幸运的地方，或者把它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痛苦之上。”

“Globaliser”一词在法语中的含义不同于其在英语中的意义。法国人提到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时，他们一般会用“世界化” (mondialisation) 这个词。Globaliser的意思是在多个问题领域间建立连接：例如，证券和经济学，或更具普遍性的不同风险的评估之间的连接。二战结束时，为了创建新的和平秩序，联合国和跨国经济机构在审慎、均衡的原则下成立：五个最强大的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永久性成员国。这些国家在世界银行和IMF中享有五个最大配额和永久性席位。但是，由于

当时的苏联未能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整个政治和经济体系开始出现分裂，并且共产主义革命让小小的中华民国 (台湾) 首先占有了IMF的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80年才取得席位。

政治和经济区域之间的联结是1944—1945年间的唯一理想。但是，经济和政治竞技场的相继分裂使得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或者说变得无法解决。要实现这种联结，需要恢复二战结束时的精神和士气，制定一种制度方案——它既具备缓解经济危机冲击的技术工具，又能够将各国组织起来，就共同的行动方式达成普遍的共识。■

哈罗德·詹姆斯 (Harold James) 是IMF的一位新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

参考文献：

Angell, Norman, 1913,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to National Advantage* (Toronto: McClelland and Goodchild).

Broz, J. Lawrence, 1997,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ichengreen Barry, and Marc Flandreau, 2010,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Rise of the Dollar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1914–39,” *BIS Working Paper 328* (Basel: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rwin, Douglas A., 1996,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mbert, Nicholas, 2012, *Planning Armageddon: British Economic Warfa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cCraw, Thomas K., 2012, *The Founders and Finance: How Hamilton, Gallatin, and Other Immigrants Forged a New Econom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ourke, Kevin H.,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1999,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Rachman, Gideon, 2011, *Zero-Sum Future: American Power in an Age of Anxie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